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八六期 ——
(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4a)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 (五)	周孜仁
【追根溯源】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 (三)	戴 煌
【乱世人物】文化心理个案	梅 溪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 (五)

• 周孜仁 •

(续上期)

八，革联会的诞生和罗广斌之死

《8 1 5 战报》出刊总是很准时的，平均每周一刊。但第八期和第九期却间隔了将近一个月。前面说了，这绝不是疏忽，而确属停刊。因为2月18日出版的第九期明白标上了复刊号。也就是说，这二十多天的生活，和《8 1 5 战报》没有太多关系。但夺权，作为文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以为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

重庆造反派零零散散的夺权早就开始，大规模的，是从1月21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次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称：自下而上夺党内走资派的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为了帮助年轻人产生神圣的联想，社论故意把上海市造反派的夺权称为“一月革命”。只可惜这儿没有围攻沙俄冬宫的呐喊、没有阿芙乐尔战舰的隆隆炮响，也没有波罗的海水兵在大街嘹嘹走过，没有穿皮夹克的卫队长，一边用梳子刮着头发，一边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员说：“先生们，你们的工作结束了，从现在，直到永远。”重庆市的政权机构：市委和市人委及下属部门事实上早就瘫痪。重庆夺权，无非按照中央意图履行某种手续而已，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冲突和值得让人记忆的精彩情节。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邹昌义，四

川美术学院聘来的战报美编告诉我说，他们学院那一帮前卫派小子对参加夺权这一历史时刻非常珍惜，在顺利收缴了各种印章后，均站在市委机关宽大的办公桌前，模仿宣传画上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流行动作，左手握毛语录本以胸护，右手则作天王托塔状，举印章一枚，逐一拍照留念。当时满街都是鼓动夺权的宣传画，画上代表政权的印章都硕大如斗，而市委的印直径只有36毫米，举在手上一一定是很滑稽的。

社会上当然是连日连夜的游行欢呼。而以重大815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正在设于重庆少年宫的总部二楼忙于分配权力。社论发表次日，便紧急召集大派各种组织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进行部署，虽然当时，学生，尤其是重大815事实上控制着重庆政治的主导地位，但从理论上却必须就以工农兵为主体对夺权行动作出安排和解释，因此应邀参会的组织确实包括了工、农、商等各种行业的代表，如工人（二七战团）、农民（红农815）、商业（财贸815）等，以免授人以柄。次日，学生代表们在同一地点继续开会部署配合与分工。这两次会议后来被反对派称为重大815分封诸侯的会议。

对于学生造反派一哄而起的夺权行动，毛肯定是不放心的。夺权号召发布的第二天，即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马上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传达了毛的指示，称：“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找解放军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称：“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重庆驻军负责人闻风而动，韦统泰军长、谢家详政委及蓝亦农、刘润泉、唐兴盛等高级将校，迅速召见重大815勤务组周家喻、黄顺义、吴庆举、秦安全、熊代富、查正理等十余人。韦军长明确称重大815战斗团是“左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并要周等主动联合其他造反组织夺取重庆市的权，同时，军队还向其推荐了财贸系统造反派头头王绍川、军工系统阳增泰，以及革命干部段大明、及重大815造反在第一时间就想打倒的“镇压革命运动的刽子手”辛易之等。三天后，26日，重庆地区七所军事院校学生示威游行，16辆军车在山城街头隆隆驶过，年轻军人一路高呼：“815好得很！”“坚决支持815的革命行动！”再一日，军事院校学生在大田湾集会，重申立场。再一日，驻军2000名指战员武装示威，对重大八一五等造反组织及其夺权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共产党是靠枪杆子夺取天下的。毛让军队正式出面干预，这就确认了事实的合法性。“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迅速组成了，正式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29日，重庆30余万八一五派在市体育场举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会上，原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全部揪到会场批斗，按惯例，一律高帽、黑牌、“喷气式”全套侍候，而后游街示众。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将老头子老太太一律反剪双臂，以手压顶，做“牛不饮水强摁头”之状。帮助回忆这次大会的“关键词”是，我记得这样一个情节：当晚，已经睡着了，突然有人敲门，接着用汽车将我接去了《重庆日报》。总编室一个女士给我交代任务，要我马上写一篇欢呼文章连夜发稿。该女士戴着一副优雅的眼镜，说话轻言细语，很有学者风度的。我早就听说过她，报社的名记者，叫沈世鸣。当时我的写作状态一定极佳，在旁边胡乱捡一张桌子坐下，稀里哗啦便一气呵成，自觉有点“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感觉，很得意。文章题目十分落套：“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署名“红锋”，文题和名字现在听来都十分恶心。很有风度的女编辑表情平静地看过我的文章，很快通过了：她好像心事重重。后来才知道她不久就参加了对立派：这消息使我感到十分遗憾。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在重大815，或者以重大815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导下进行的。重大815的影响力和权威不是谁封的，而是几个月文革动乱造就的一个事实，以至于支左驻军首先接见他们，与他们取得共识。这无疑就大大加重了他的份量。我作为该组织的成员，并且和上层成员保持着特殊关系，客观地说，和追求浪漫、自由、创造，非常情绪化的文科学生相比，专事工科的重大815学生更多理性、实际、固执和秩序感。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当初，如果重庆市委不那么急于把他们的校长置于死地，重庆文革的最先发难者，很可能就不会是重大，也不会在8月15日了。他们造市委的反，皆因工作组伤害了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党的化身：对同学一贯客客气气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郑思群。工作组所作所为使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不能不反了。人家骂他们“右倾、保守”，甚至骂他们“保皇起家”，坦率地讲，此话有理。问题是历史偏偏把815推到了那个位置，而且从本质上讲，他们的秉性恰恰和军队领导的胃

口非常对路，自然一拍即合。对此，西师831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要耍点娃娃脾气。24日下午一时，根据22、23日会议的决定，主持对市委机关夺权的重大815如期赶到，而主持人委方面夺权的西师831却迟迟不按期就位，最后就根本没有来。召集人缺席，只好由其他单位将收缴的印鉴、钥匙、文档等封存待处。

政治斗争中，耍娃娃脾气，患点“政治感冒”之类的“小病”以搁摊子，有时候当然不失为一种要挟对手的手段，袁世凯不是谎称“脚疾”，和急于要他出山的清王朝讨价还价吗；文革后期，因为不满某种政局而“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老干部，不是大有人在吗。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做后盾方能待价而沽。对立派实力的黄瓜刚刚起蒂，嫩着呢，你要娃娃脾气有什么用呢？权利的诱惑大得很，你不干，反正有人干。按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地球照样转动。眼见得新政权已经成立在即，反对派才感到必须采取实质性行动了。下面这则几十年前的消息出自《山城战报》第二期文章：“二月黑风从何而来”。文章说：

“元月26日，罗（广斌）请一司、三司、西师八三一、‘徐派’等等各组织在罗家密谈，声称：‘我们搞不起大联合，就先搞小联合’”。

消息的真实性现在已无法考证，而下面的情况当是确信无疑：29日的“革联会”筹备大会的召开，已经把他们逼到绝境，必须行动了。第二天，30日，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等40余造反组织在人民路小学正式集会，成立反革联组织“联络站”（全名已不详），会议联名向中央发出“加急电”。现在我已找不到该电文的原稿，据2月9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重庆版创刊号载，电文主要内容如下：

“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周家喻为首的一些群众性组织的领导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们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大夺权的指示，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客观上迎合了黑市委的需要，于一月二十四日，以重庆十二所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排斥了所有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单方面的接管了黑市委和重庆市的全部市一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大权，为了使这种非法接管合法化，他们于一月二十六日拼凑了一个‘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筹备处’，这个处的周家喻等结党营私，拉拢一批工人组织的领导人，排斥大多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拉拢一些追随右倾路线的外地学生，排斥与之作斗争的来渝串连革命师生。一月二十九日这个誓师大会发表的紧急通告，竟宣布由大会主席团组成重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这个由周家喻等一手炮制的、排斥了大多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的、根本违反巴黎公社原则的联络总站，接管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这一系列行为，激起了全市广大工人革命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坚决抵制。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夺权，而是假夺权，这不是真正的大联合，而是在搞分裂。其实质是欺骗群众，使黑市委窃据的各种大权名亡实存，使我市文化大革命流产。”

因广斌同志姓“罗”而工人造反兵团司令叫黄廉，故该组织被815戏称为“廉罗栈”。和会议配合的是，西师831等组织同时开始诉诸舆论，提出了“革联会是大杂烩”、“踢开重大815，自己闹革命”诸观点，甚至极不理智地大骂革联会是“枪口下的大联合”，当时学生政治智慧之稚嫩，可见一斑。当然，口号的中心是：“砸烂革联会”。因此，反对派就有了意思不太雅但音节十分响亮的名字：“砸派”。因意思不太雅，几个月后，刘结挺到重庆视察，这才亲自给取了个新名字，叫：“反到底”。这是后话。

“砸派”联络站的成立会尚未结束，2月1日，便已有与会者到重庆大学告密。815马上还以颜色。我记得时间是中午，总团团部突然通知我，要我马上起草一份东西，揭露对方的阴谋。紧接着全团动员，地点还是在松林坡礼堂。那一天会场的气氛是十分激愤的。现在我已找不到该文文本，反正我记得我写得很快，也有点“日试万言，依马可待”的感觉。文章在大会上一读，顿时群起应合：通过。接着印发各战斗组抄写成大字报若干，几千人即刻出动，一个下午，便将全市七区三县的大街小巷全部覆盖。

事情已经十分明显，考虑到罗广斌在砸派内部的特殊影响，815擒贼必先擒王。谁叫他当初要从渣滓洞里逃跑出来呢？现成一个称谓就足以让你泰山压顶：“叛徒”。更何况他还在文艺部门混迹日久：文艺部门本来就是毛最不放心、最想打理的角落。1月31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首先散发传单并张贴大

字报，明确定义：罗广斌“历史有问题”、“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是“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是“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正式发出“通令”：抓捕罗广斌。派网恢恢，疏而不漏。砸派的力量实在太小了。自顾不暇呢，谁还能保得住本身就软肋的罗呢？2月5日，重庆建工学院815派的红卫兵，轻而易举将罗广斌从市文联的家中绑架，抓走了。

精神领袖被抓，小兄弟更是进退维谷。参与联络站的组织于是三三两两，悄然退出，只是砸派的始作俑者是无法退的。2月6日，西师831和重大815分别代表砸派和革联派在解放碑举行规模浩大的辩论会：当着全市老百姓的面，这大约是两派主要首领最后一次仅仅用语言的平等较量——以后的较量完全就凭借暴力，甚至枪炮了——革联派主辩为重庆大学周家喻、秦安全、熊代富，砸派方主辩为西师周荣及其他成员。其日春雨霏霏，寒意犹浓，而解放碑四周的街道上人山人海，气氛空前火爆，连楼房上都全是人头攒动。客观地说，作为文科高材生，周荣是极具辩才的，但在工科学生逻辑严谨、不紧不慢的对抗面前，他却越来越力不从心。开始，主席台下四条大街一直阒无人语，所有人都神色专注屏息静听。辩论至一半，周围大楼的窗口便陆续挂出大标语：“砸派毫无道理！”“革联会好得很！”“815好得很！”继而听众开始向砸派辩手起哄，这类辩论是不需要评论员和仲裁人的，听众山呼海啸般的喊叫宣布大会以革联派大获全胜而告终。文革中重大815有个专业的辩论组，番号为“101部队”。组长叫柴天祺，动力系五年级学生，1976年死于唐山大地震。在学校时也参加业余文工团，在合唱队唱歌。他的歌喉实在很一般，不料文化大革命却让他的口才大露头角。他曾经告诉我一个诀窍，说辩论成败，很重要是事前要组织好听众，一定要让同一派的听众坐前面，辩论过程中要不停给对方辩手提问题、递条子、甚至起哄，千方百计扰乱对方思路，破坏对方情绪。柴天祺甚至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有天他和首都三司一位女辩手辩论，题目自然是关于以周家喻为首的重大815右倾诸问题。辩论中该女辩手模仿毛泽东一贯的口气，说一句气吞山河的话：“周家喻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由于被台下精心组织的听众搅昏了头，该女士一急，把“老虎”二字说漏了，上面的话就成了：“周家喻的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柴天祺马上提醒女辩手，说：周家喻是个男生，你摸他的屁股不合适吧？一阵大笑顿时把北京人哄下了讲台。2月6日解放碑的大辩论，学生们好像还没有掌握这种诀窍。我是以一个听众身份站在台下的，我以为那天的气氛挺正常。

下面的事件就如流水下滩一样顺理成章了：

2月8日，“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

2月11日，革联派宣布市文联三个反革联会的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2月12日，在大田湾体育场举行革联会成立大会，欢呼“新山城”的诞生。砸派到场造反未遂，当晚，又到《重庆日报》社抄砸大会报导铅版。毕竟“新生红色政权”已经建立，社会需要秩序了，再由不得你胡闹了。革联会早在2月8日已发布《公告》，正式宣称已成为重庆市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公告》第四条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公安机关以砸坏有毛泽东照片的铅版为由，抓捕了831为首人员。军队旋即开入报社实施警卫。

同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渝联络站被革联会一派抄砸。

接下来，14日，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驻重庆大学分点、川大八二六驻渝联络站等，被革联派抄砸……

一切都似乎已成定局。被囚禁在马家堡某军事院校的罗广斌深感大势已去，遂于10日早上八时许坠楼自尽。他是从三楼的窗口跳下来的。离地距离为1073厘米。头先触地，头颅从鼻梁起向上，正好裂为两瓣，

很像美国科幻电影里机器人被砸开的头壳，碎脑莘莘可辨。朝上的半个脸，大眼犹愕然圆瞪，蹦之欲出，另一只眼则闭着，半个脸乱血纵横，脑浆、头发、碎皮……像机器头颅里崩出的散碎零件，绽得满阶满地，其状恐怖万端。据笔者保存的资料，现将整个过程的介绍照录如下：

“从二月五日叛徒罗广斌被抓到畏罪自杀，一直由建院八一八等革命组织的三位战士看守”，“二月九日，某院校广播了罗广斌的罪恶历史，叛徒罗广斌十分恐慌，情绪反常。九日，罗广斌开始写书面检查，写到解放前夕被释放的情节时，他就停止往下写了。当晚十二点后才睡觉，整夜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十日晨八点，罗到三楼卫生间洗脸和解便，看守人员张X X（建院八一八战士）在厕所外面等候，约两分钟，张不见罗出来，回头看时，罗已趁机爬上窗台，张急忙喊了一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却从窗口跳了下去。”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是自杀？还是他杀？事后曾被两派、尤其是替他打抱不平的砸派炒得沸沸扬扬。事情一直到了第二年3月15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50军、54军领导的会议上，才由口含天宪的江青一锤定音，曰：“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两派从此哑然，谁都不想在已由主席夫人拍板钉钉的事情上浪费口舌。一代才子罗广斌，只能悄没声儿地成为了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第一道祭品。重庆的文化革命，从1966年夏天开始，吵吵嚷嚷闹过许多回惨案：“八二八”，被市委渲染得天昏地黑，没有死人；一二四，被造反派，包括罗广斌本人，渲染得天昏地黑，也没有死人。到了夺权，一切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却死人了。正是曾为莫须有的文革烈士大喊大叫的罗广斌自己，成了造反派的第一位殉道者。他太性急了。连扑向死神的怀抱也那么急急匆匆。

上面提到的照片，共十五张，除了关于尸体不同角度的照片外，还有这样两张图片和说明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猜测罗殉难前的悲楚和犹豫。图片十四：“二月九日（自杀的头一天），罗就在语录本内的一张照片（‘渣滓洞监狱’）的背面留下了遗言‘这本毛主席语录和这张照片是胡蜀兴（笔者注：胡为罗广斌夫人）的’”。还有图十五：“叛徒罗广斌进厕所时，把围巾、呢帽、华达呢皮袄一件挂在厕所内。皮袄内有手表、钱、粮、毛主席语录本、照片等物。叛徒罗广斌把名贵的皮袄（貂皮领）、手表、照片等物留下来，正是他自杀前的准备”。

这份资料我是因一个偶然的原因保存下来的：1967年6月，重大815战斗团为了反击砸派的攻击，在我们印刷厂印了一份对开大小的宣传材料。前面提到的照片和相应的说明文字，就是印在那上面的。纸质不错，数量却很多，没发完，一直就堆在角落里。到冬天了，闲来无事，我想钉一个本子抄些二胡曲谱，就去检来一摞，裁成8开大小，订了一大本。几十年后，为写这篇文章，我才忽然想起这本乐谱，于是翻出来，拆开：那些可怕的镜头于是重又由几十年前跳到我的面前。而照片的背后，全是我手抄的、年青时候最钟爱的乐曲：《北京有个金太阳》、《山村变了样》、《三门峡畅想曲》、《金珠玛米赞》……，将这张纸页的两面对照检看，我觉得真是对那个年代绝好的嘲讽。

他一生向往革命，为此不惜背弃优裕的权贵家庭。国民党把他投进黑牢，共产党却对他并不宽容。他曾用横溢的文学才华抗争，成功了，是令人羡慕的巨大成功，但没有丝毫改变尴尬的处境。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压根儿不知道发动者的意图，但对于个人，他以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开始用全然不同于文学的手段再次抗争——这恰恰是他的弱项。他想重登彼岸，却被一脚踹进了没顶的惊涛骇浪。他是一只扑灯蛾。他一次又一次扑向光明，最后却被无情的火焰整个儿烧毁：这就是罗广斌的故事。我不知道文革史家们对罗广斌之死有什么新的考证。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自杀的。这不再是出于几十年前的派性偏见，不是的。而是：我以为，他的自杀更符合文化革命的悲剧性逻辑。

（未完待续）
~~~~~

【追根溯源】

• 戴 煌 •

（续上期）

◇ 造神的结果，既毁了国家民主法制和社会道德文明，又使物质文明徘徊不前，并扩大了腐败黑暗面，迫使亿万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

1970年秋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与作家埃德加·斯诺重访中国。直到当年12月25日，新华社才公开报导：毛泽东主席最近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同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与林彪当年10月1日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当谈到“文化大革命”话题时，毛泽东对斯诺说了我国的一条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一般人都认为，毛泽东这说的倒是大实话。其实，早在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在大谈“阶级斗争”的时候他就说过：“法治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就是要靠人治，不靠法治。”这“人治”靠谁？只能靠具有神的权威的最高领袖。此前此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史实证明，靠的只是他毛泽东一个人，而不是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等在内的领导集体——这领导集体中的很多人都被打倒或靠边站或委曲求全了，只有他做这“人治”的主心骨、做全中国的领导“核心”，一切的一切都由他个人说了算。到了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及其左右所用的主要手段就是把单纯无知、热情盲动、狂热迷信的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发动起来大搞“阶级斗争”，打倒政敌，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了首都及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检阅了这声势浩大、人人手挥小红书的“文化革命大军”的大游行。8月31日，在天安门再次接见50万红卫兵与革命师生。9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启动了全国性的吃住行都不要一文钱的大串联；全国各类学校几乎都“停课闹革命”，十岁上下的男女孩子们就整天悠悠逛逛，任其荒废金色童年。

然而，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和检阅“革命小将”或“红卫兵小将”的活动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越来越多：9月15日100万，10月18日150万，11月10日至11日200万，11月25日到26日250万；据报导，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文化革命大军”，总人数达1100万。

在所有这些接见与检阅中，每次都由也是手挥小红书的“林副统帅”首先发表讲话，他强调：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当权派们的社会基础——一切阶级敌人”。于是，从8月22日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注：所谓“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猛烈冲击资产阶级风俗习惯”的打砸抢风潮席卷首都各街道，为此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好得很》。8月24日，上海、天津的红卫兵和商业职工也向所谓“剥削阶级的‘四旧’发起总攻”。同一天，人民日报为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在毛主席的“造反有理”的那封信的鼓励下所采取的过火行动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文章，一个劲儿地鼓动年轻幼稚的青少年进行疯狂的打砸抢。这些受骗上当的青少年，不但对“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中的许多人施予打砸抢、剃鸳鸯头，把一些被打得血肉模糊但还能动动嘴唇或动动胳膊的人和已被打死的人同车拉去火化，不但对孔庙、龙门石窟、云岗石窟等文化古迹肆意进行破坏，不但将矗立于南京新街口大圆盘中心的孙中山先生铜像搬到难见天日的所在，就是对海瑞墓甚至瞿秋白烈士墓等等，也掘墓砸碑曝晒遗骨，丧绝天良！

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把千古至今的一切享有美誉、值得善良正义人等崇敬的名人都毁誉殆尽，把他们所迷信崇拜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大树特树为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唯一项天立地的伟人。

196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鼓吹“中国红卫兵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革命影响”。第三天，首都红卫兵就火烧英国驻中国代办处，“造反”造到了异国他邦外交代表的头上！

在这个“巨大革命影响”中，国家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根据党中央要各地“革命师生”来京大串联的通知，周恩来总理确定所有来京大串联的师生，其膳食费用及粮票等，都必须由原省市负责偿付；但毛泽东主席却说：来北京串联闹革命，吃饭还要钱吗？！于是决定一律免费。据“文革”开始不久由国防口调任北京“新市委”副秘书长和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吕鸿同志的回忆文章说，总站下有几个分站和四千多个接待点（不包括各区所设的接待点），从北京以外的十三个省市调来1500余辆公共汽车和6000多名汽车司机，加强北京的公共交通线。北京的交通、粮食、副食、供销、医疗卫生等部门全力以赴地协助各站点对来京的师生实行“五包”——包住、包吃喝、包交通、包医疗、包安全。原估计前后总共会来京500万人次，但有的参加一次“大接见”还不满足，还要等到下一次的“大接见”，以致来的红卫兵越聚越多，最多的一天曾达300万人。为完成红卫兵进出北京的输送任务，一度将一般客运集中到西直门车站，而腾出北京站与永定门站专门输送红卫兵，平均每天各60余列火车，最多时各达100余列。到1967年2月中央决定停止大串联为止，吕鸿们接待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多达1100余万人次。在“大接见”中，由于不顾一切地向前拥挤争看毛主席，一些年幼体弱的学生还被挤倒踩死踩伤；有时候离京返程的红卫兵争抢车座，也有人被推搡挤踩当场死亡；有的南方来的红卫兵由于来时衣着单薄，而归去时已天寒地冻，在途中冻死冻伤……

1966年10月5日，党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决定除野战部队外，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党组织可以不要了！

同年12月25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经过他人的精心策划，带头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打出了“彻底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的旗号，并散发《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十大罪状》的传单，把“打倒刘少奇”运动推向全社会。庄严的国家大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的国家主席，统统都不算数了！

而在前不久，即12月13日，刘少奇应毛泽东之约，作了最后一次交谈。刘少奇诚恳地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这一席肺腑之言充份说明，此时刘少奇已完全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对着他刘某人来的。所以他主动要求下台，避免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们跟着受苦受难，避免又一次全国性的劳民伤财。然而毛泽东对如此痛切的要求不置可否，只“建议”刘少奇“认真”地读几本书，并具体介绍了德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和传播者海克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两本书，弄得两人再无话可说。送别时，毛泽东只对刘少奇说了句“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这两位从1922年共同从事安源矿工运动起共事40余年的战友、同志与同乡，就这样永远地分开了！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月3日，上海造反派就首先刮起了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的所谓“一月风暴”；1月4日至6日，上海文汇报与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夺了各自报社的党政大权。毛泽东立即赞扬这是一个大革命。其间文汇报发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来上海市党和政府的一切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说什么必须对之彻底打倒。8日，新华社予以全文转发，次日的人民日报全文照登并加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高度赞扬了他们的造反夺权行动。12日，人民日报又对此发表社论，再次强调“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14日，山西“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和太原市党政机关大权，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9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委员会”等发表《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出出版大权，担负起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政治任务》通告，人民日报也立即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22日，人民日报又进一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掀起了

全国广泛夺权风潮。25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告已全面夺取了全省党政大权，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为题发表社论大加赞扬。28日，“上海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等57个造反组织发表《致全国革命造反派和全体革命同志倡议书》，倡议春节期间（即当年2月9日至11日）不放假，全力展开群众性夺权斗争。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组织和驻军指战员举行“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已接管了全省党政大权，人民日报也跟着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2月5日，经过各派的讨价还价，上海建立了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先叫“上海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为领导成员，然后各省市造反派相继夺了权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4月23日，6个省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在北京交流“夺权掌权的斗争经验”，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这六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并同他们一起观看了现代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给他们以极大鼓励。

在这势如破竹的夺权过程中及其前前后后，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及他们的“死党”、“余党”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早在1967年的1月18日，还住在中南海的刘少奇家的电话就被拆除了，只能通过自己的几个孩子到外面去看看大字报了解点滴“革命”信息。4月1日，红旗杂志推出了戚本禹的经毛泽东审阅批示发表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公开提出“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很快，中南海内的造反派闯入刘宅，“勒令”刘今后必须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自己打扫卫生，必须改变夜里工作、上午休息的习惯。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的批斗大会，主斗刘的夫人王光美，并在她的脖颈上挂了一大圈破鞋，恣意对她进行人格侮辱。对国家主席和党的中央常委及其夫人都如此违法无理，对各地被夺了权的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如何蹂躏，就可想而知了！

7月13日，3万多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接连三天游行示威“声讨”刘少奇。18日晚，中南海秘书局造反派经江青首肯，在中南海大食堂举行揪斗刘少奇大会。8月5日，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大字报并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同时，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的声势空前浩大的誓师大会，中南海内则由康生之妻、“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指挥，召开了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会。9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王光美被关进秦城监狱，并以莫须有罪名逮捕了大批有关人员。

1968年10月13日——31日，在北京举行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前，实际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指导的所谓“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已用伪证九易其稿地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作出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注：通过这一决议时，只有陈少敏同志一个人假装打瞌睡没举手，事后也遭了大难）。而在事实上，早在“文革”伊始，没有通过党内外任何合法手续，刘少奇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包括全国人代会选举的国家主席一职，就都被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地化为泡影了，党籍也等于早被“永远开除”了！特别具有“匠心”的是，还蓄意选在11月2日刘少奇年入古稀这一天，全国所有报纸向亿万人民公布了上述决议。刘少奇当即浑身颤抖，大汗淋漓，继而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升至260/130毫米汞柱，体温摄氏40度！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毛泽东心目中，党章、国法早不存在了，早就是几张废纸了！虽然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要遵守国家大法而不要搞独裁，比如“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毛选五卷19页）“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像不独裁就不像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毛选五卷209—210页）“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毛选五卷358—359页）可是，前文已说过，时隔不久，他就自食前言说“法治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就是要靠人治，不靠



法治”，把“一定要守法”和不要“搞个人独裁”抛到了汪洋大海。后来他巨手掀起“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的滔天恶浪，更是在所必然的了！

既然毛泽东主席带头“老和尚打伞”，那么跟着冲锋陷阵的各式各样的大小“和尚”则更是人手一把“伞”了。真可谓“一阵阵风云变幻，一个个登台表演”。那些掌握了或大或小实权的人物，不但封杀一切正常人的思想，将遵照党章国法办事的人投入监狱，就连所有民主党派甚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都被弄得名存实亡。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就居然由中共中央而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4年10月11日发出，可见整个国家的法制被践踏到何等地步。

全国万马齐喑，人人自危。但不满与反抗之声并未完全消隐。为清除和压制任何的不满与反抗，1967年1月13日，就是毛泽东约刘少奇作最后一次谈话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所谓的《公安六条》）。这个规定是江青、陈伯达首先提出，由谢富治、张春桥等人起草，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后由毛泽东“圈阅”发出的。它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等各类人员及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活动，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惩办。

这六条实际执行中，重点是第二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而且又扩展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稍有不满的，也以“现行反革命”治罪。此前，只是一些造反分子和红卫兵任意打杀无辜；而此后，“六条”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经过所谓的“法律手续”的大量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我国有为青年和革命干部中的思想先驱者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人，就是因为触犯“第二条”被残杀的。有许多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思想先驱者，而是对“伟大领袖”诚惶诚恐的信奉者，只是在敬忠活动中偶有失误，也被枪杀了。如一位造反派在书写“刘少奇的丧钟敲响了”的标语时，魂不守舍地把“刘”错成了“毛”，立即被判了死刑；一位医生在医院打扫卫生，匆忙中将桌上的毛泽东石膏像碰落地面摔碎了，也被判了死罪……

这种重大冤假错案究竟有多少？据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万五千多件，涉及十八万四千余人，“其数量之大，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那么压根儿没有经过“法律手续”而惨死的有多少，则是谁也没法说清的。现在只能这样说：在“公安六条”公布之前，被一些造反分子和红卫兵小将任意打杀的固然无法统计，就是在这“六条”公布之后，被任意

打杀的就更多了。如湖南道县和江西一些县的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就处死了所属“全县的阶级敌人”——即其县境内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等，包括他们家里的老人和婴儿，“悉数处死，靡有孑遗”。这些地方有的河道一度漂满浮尸，河水血染，与希特勒法西斯匪徒对犹太人之残忍大屠杀景象并无二致，而这又是对自己本民族之骨肉同胞！此外，广西的一些地方还发生了活吃人肉的惨剧——农村集镇赶圩（墟）（即赶集、赶场）时，如有人大喊一声“这人是‘公安六条’的对象”，或者武斗的一派把对立面的人诬指为“六条对象”，立刻就有许多人一哄而起地齐声呐喊“吃啊——”，马上就有“勇敢者”手持尖刀上去，取出其心肝当场爆炒或烤熟下酒，说什么这样吃可以“长命百岁”，从而出现一幕又一幕灭绝人寰的惨酷景象！

在这种恐怖背景下，中国大陆只有奴颜媚骨或缄默不语而尽绝英才诤言了！1973年9月28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署名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辨》，同年10月31日又发表陕西师范大学写作组的文章《秦始皇是坚决打击奴隶主复辟的政治家》，次年1月21日又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略论秦始皇暴力》，等等。所有这些文章，都公然为秦始皇的丧失民心之举大唱赞歌，为当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残暴行为提供古已早有的“法理”依据。

因此，经过连续数载的天下大乱，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天下大治”。国人耳濡目睹的不仅仅是文化的一片荒漠，经济徘徊难前，而且社会文明道德风尚日益沦丧。那些无须真才实学而只要能够围绕着神像进行“各种精采表演”的投机家、野心家、阴谋家都一个个腾达飞黄，为所欲为，鸡犬升天，又相互争斗不已。他们人人自危，只有牢牢地掌握权力才可确保平安。所以夺权保权，成了他们中很多人的生活第一主题，中国大陆几乎成了从上到下夺权保权大混战的战场。其结果，似乎一切都缺乏安全感，包括“伟大领袖”本人。先后跟他老人家当过秘书因而应该是最了解他的为人的柴沫、田家英等人都相继自杀了；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彭真和坚决主张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行动指南而写进“七大”党章、后来又是《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的刘少奇等人，只是有些不同意见，即打倒的打倒，整死的整死，这种结局也可以说是众叛亲离了吧。以致到了最后，他老人家似乎仅仅信赖自己的侄儿毛远新和贴身小秘书张玉凤，有时候连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人要见他老人家，也必须首先通过毛远新或张玉凤这一关。

这也难怪，孟老夫子早有言——“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更何况，这些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选三卷1025页）的革命同志，如今就被革命之“君”如此地视如草芥，大家嘴里虽不敢说“不”，但在内心深处对这“君”如何“视”，不是无言也可喻的么？！

同时，所有起劲的造神者也该吸取这样的教训：不怀好意，想假借造神往上爬、攫取更大权势的如林彪、“四人帮”之流，固然必会遭到历史的惩罚与嘲弄；就是当初满怀好意，如第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彭真和第一个主张把“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的刘少奇，一旦怀着同样的好意对毛泽东违背党章、国法之为提出规劝，结果也同遭灭顶之灾。因为他们既造出了“神”，这“神”就会无所不至地施展其“神威”，最后也“神威”到他们自己的头上。这也正如署名阿敏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杂文所说：所有的“造神”者都会落个相同的结果：在没收他人权利的同时，自己的那一份也被没收了。

在全国许多地方频频出现的、有的连机关枪火炮都上了阵的武斗中，双方很多人就在“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狂呼声中“英勇壮烈”了，很多地方混乱得“只革命不生产”。人民日报不得不奉命连连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立即制止武斗》，等等。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但在9月9日，不知是谁下令，竟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个通知，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江青的所谓“文攻武卫”的讲话，武斗之风又重新刮遍全国。于是，在周恩来等同志的不断努力下，中央一级又连连发出制止武斗的通知、通告、通令、命令，陆续召开有对立两派参加的解决某省某地武斗问题的专题会议，办“学习班”撤换一些起“关键”作用的地方领导人，逮捕一批坚持武斗的“坏头头”，甚至派部队包围执迷不悟的武斗集团，武斗风潮才慢慢平息。

然而，由于“文革”这封建法西斯路线并未得到纠正，公开的流血武斗又改为不流血的暗斗，纷争仍然难

已。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出通知，转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等于老人家自己也承认这八年是动乱而不是安定的。直到197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对已发生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的地区和单位，要求所在省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夺的武器，集中封存。此后，才短暂地“安定团结”起来。

但就全局言，这已是晚而又晚了！在这举国连续多年混乱倒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历史上许多农民革命一样，为许多野心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乱中夺权、混水摸鱼的“神赐”良机。他们只须紧紧地攀援着“三忠于”、“四无限”的钢索，把单纯无知、虔诚迷信“伟大领袖”的年轻人煽动起来为其火中取栗，就稳获蟒袍玉带黄马褂了。此外，这种局面也造就了一批批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求平安吃闲饭的人，他们得手就从工厂、学校、机关、单位把公物“捎带”到自个儿小家去，“不捞白不捞”。所有这些攫取了政治权势和物质利益的人，都视善良、诚实、本份为懦弱或“傻冒”。保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尚情操的人固然几近于绝迹；就是与人为善、以诚相见、助人为乐、对无辜苦难者的恻隐之情，也难得一见。往昔在商场、饭店、火车站、公共汽车站乃至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文明礼让之风也荡然无存。而常常可见的则是横眉立目、凶狠残暴或冷漠猜忌互有戒备。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尊老爱幼”、“师道尊严”等等也早被批成是“骗人的鬼话”。1973年1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徐惟诚挂帅的北京日报发表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及编者按，并加上自己的编者按，再次掀起一股大批特批师道尊严的浪潮，使孩子们更蔑视给他们辛勤输送文化与文明养料的师长。一个半月后，即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又以《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为题，发表那位小学生黄帅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为黄帅这孩子被人利用的行为唱赞歌。

如此等等，使千古以来的优秀道德大厦骤然崩溃了，人性中最凶恶、最残忍、最刁钻、最阴险、最自私、最无耻的一面，反而有了广阔施展的余地；懒散、松弛、无政府主义的现象到处泛滥。尽管国中为数不少的工人、农民、工程技术人员仍在出大力流大汗，默默地坚持诚实的劳动，但整个国家的经济处于起伏不定的低谷中。1971年12月31日新华社报导：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我国农业获得第十个丰收年（1962年算起），粮食总产量达到4920亿斤（注：此时林彪叛逃已三个半月并已昭告全党全国全世界，还说毛林体制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真令人莫名其妙！）。1972年12月30日新华社报导：我国农业生产获得好收成，粮食总产量可达4800亿斤，相当于丰收的1970年水平。这不禁使人又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不和1971年比而与1970年比？如果1971年的4920亿斤不是假的而确有其事，那就是1972年比1971年减产了，只好与“第十个丰收年”的1970年相比，以示1972年也是一个“丰收年”。

那年头，经常就是这样变了法地“鼓舞”人心的。而实际上，在农村，正狂刮极左风。其理论根据，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于是取消了农民家庭宅前宅后的自留地，也取消了所有的集市贸易。“四人帮”们狂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是他们自己每日宁吃那“资本主义的苗”也不吃“社会主义的草”；有些省区的掌权人也大喊“鸡头鸭头不得超过人头”，然而他们自家每年上桌的鸡头鸭头不知超过人头多少倍！

这种所谓的“彻底革命”的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必然影响到工业战线。1974年6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年上半年的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略影响较大。与1973年同期相比：煤炭下降6.2%，铁路运输下降2.5%，钢下降9.4%，化肥下降3.7%……

顺便带一笔：这种“跑步进入”没有阶级、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因素的极左思潮，不但盛行于全中国，也扩展到国外。1975年革命胜利后，老挝干脆取消了货币，就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红色高棉”更在全国实行男女分住“大集体”，彻底消灭了健全社会的细胞——家庭……

物质生产困险重重，全国上下并不都是“全国一盘棋”地过苦日子。往早里说，1957年之前就已显露端倪的特权腐败现象，在一场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把一切敢于进行批评的人镇压下去之后，就进一步滋长蔓延了。“伟大领袖”与其夫人江青女士，在这方面就带了很不好的头。

比如说，在全国所谓的“三年灾害”刚刚饿死了几千万人之后的1962年，就有现代高俅式人物在北戴河为毛泽东专修了新的别墅，把原来的别墅让给江青专用了。几乎与此同时，在紧挨老人家故宅韶山的滴水洞，也修了一座客厅、卧室、办公室、运动室、游泳池、防原子弹洞等应有尽有的豪华别墅。另外，此前此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南宁、成都、郑州、长沙、南昌、济南、大连、青岛、庐山等地，也都有他的别墅；有的一地还不止一座别墅。在太原，他虽未及垂青，但也修了“迎泽宾馆”、“迎泽公园”、“迎泽大街”和“迎泽大桥”，随时准备他巡幸；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青海、新疆等地，也有人给他砌了别墅。昆明别墅的图样也设计好了，派专人送请他过目是否合适，他认为设计得很好，那又是个四季如春的美好所在，但海拔较高，不去，这才为多灾多难的骨肉同胞省下一大笔银两。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田家英奉命带了一些人去湖南农村调查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共产主义大食堂”等生活情况，首先看到了几乎与滴水洞别墅同时落成的省委宾馆大楼，十分惊讶，他避开省里的陪同者在调查组的同志们面前撇撇嘴悄声说：“也不看老百姓吃的是什麼、住的是什麼，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爱享受了！”此后就有人说：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位帝王或总统、国家元首，都没有毛泽东的“行宫”、别墅多。

而且所有这些“行宫”和别墅，都像毛泽东垂青任何地方或家庭时接触的桌椅板凳、茶杯茶壶等物一样，都被当作圣物一样珍护：每个别墅都有成连成排的武装部队日夜守护，所有的管理人员、厨师、服务员都原封不动，所有的房屋与设施每天都打扫整理得一尘不染，随时准备着“伟大领袖”突然幸临。即便他已仙逝，这些“行宫”和别墅还当作历史文物保留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为彭德怀、陶铸和“六十一人”平反，悼念陶铸的文章由新华社记者李耐因、赵淮青搜材撰写、由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与陶铸曾共事多年的赵紫阳署名发表。李赵写好初稿专赴成都请赵紫阳审定，赵就特请他们去老人家住过的成都别墅居住。晚上洗澡，那水管流进浴盆的竟是黑锈汤，不知换了多少盆，最后流出来的还有一点锈色，他们只好凑合着抹一把。

但外国元首光顾较多的杭州刘庄别墅（现称“西湖国宾馆”）一直维护得相当好。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元帅说，他看过很多国家元首的行宫别墅，其豪华庞大、设备周全、环境优美，都比不上刘庄别墅。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住进这座别墅留恋忘返，陪同人员经过请示只得临时为其改变行程，让其夫妇在那儿多享受了一天。

“伟大领袖”如此，其夫人江青如何就无须多费笔墨，只要看看近年《百年潮》杂志刊发的、当年奉命跟江青当秘书的杨银怀同志写的《我给江青当秘书》就一清二楚了。其中单是《江青的‘女皇’生活》一章，就活脱脱再现了这位“女皇”比慈禧太后还太后。这就使人觉得，在“伟大领袖”身边三十七年的江青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因此在那些权力暴发户看来，“什么‘斗私批修’，都是懵人的！”于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口头禅响遍全国。吃吃喝喝，沾花惹草，化公为私，贪污受贿，买官鬻爵，招工参军升学走后门等等，见怪不怪。只要嘴头儿上“突出政治”，“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便是男盗女娼，也是“生活小节”，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不仅有“林副统帅”的“小节无害论”作护身符，更早有“伟大领袖”的这席话作后盾——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提到一些党员干部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倾向时说：“这些同志，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看也是相当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虽然后来出《毛选》五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但“打江山坐江山”的人们却代代相传地铭记不忘，并且想方设法地维护他们的个人权威与既得利益，坚决不允许他人“说三道四”地揭露其治下的弊端与阴暗面，以蒙骗愚弄人民大众确信其“领导英明”，再加上刺刀与大棒的咄咄逼人的威吓，

自愿不自愿地默默接受其驱使奴役。因此，这股特权腐败风愈刮愈烈。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然而这“社会主义大厦”的每梁每柱都已满是口吐人言的白蚁，如不将其一一拆下放进浓浓的灭蚁汤里狠泡死煮，是没法把它们消灭干净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甚至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仍不断发表这样一些文章、评论和读者来信：《大吃大喝可耻，艰苦奋斗光荣——记黑龙江省集贤县委坚决抵制大吃大喝风》（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通讯）、《大吃大喝可耻，艰苦奋斗光荣》（197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专栏大标题）、《对‘溜派’、‘风派’、‘震派’人物提出批判与忠告》（1978年1月27日解放军报读者来信）、《坚决反对搞特权》（197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改造社会风气是全党的任务》（1979年6月8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等等。可见“文革”浩劫进一步扩展的腐败风之深重！

与此相对照，则是大批农民失所流离，到处乞讨。即使在得天独厚的首都北京城，也都随时可见这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这正如左拉在其《饕餮的巴黎》中所描述的那样：一边是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一边是饥寒交迫，身无分文！

从不顾国情地强搞“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直到孤注一掷的“文化大革命”，全国农村究竟有多少人生计困顿？据在新华社搞了多年农村报导后去《了望》周刊当了副总编辑、总编辑的陈大斌在其近著《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书中（19页—20页）说——

1978年全国农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指土改后到公社化前的那些年，农民们说那是他们的黄金岁月、太平盛世）的约占三分之二，具体地说，就是有五亿三千万农民不如二十年前，再往深一层说，公社化二十年使三分之二的中国农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让人惊心的是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抗日战争前的三十年代（指1936年，农民吃粮水平并没有当时的统计资料，是根据当时全国粮食总产和人口总数计算出来的）！

再看看农民的现金收入：1978年，我国农村约有一亿一千二百万人口每天只能挣到一角一分钱，有一亿九千万人每天挣到一角三分，有二亿七千多万人每天可以挣到一角四分。山西雁北地区平鲁县的农民每天只能挣上六分钱。所以有些农民哀叹：“堂堂七尺男子汉，人民公社好社员，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早起干到日头落，不如母鸡下个蛋！”有的地方农民出工在村头上，看见地上有个东西闪亮，捡起来一看，竟是一枚五分硬币，于是叹道：“这一弯腰比干一晌活挣的还多！”

◇ 该做小结了

浩劫连浩劫，把中国“主人翁”们的一切热望都扼杀了！！因之有人说，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本是人类社会所共同信奉的至高无上的伦理价值。而革命只是一种社会运动，它本身不是价值，也无法以人民的自由和生命为原料生产出价值。革命的是与非、合理与不合理，是要由别的价值标准——即人民的真正解放与实际幸福来作检验和评判的。因此，斯大林大元帅的大清洗与毛泽东主席的极左路线就足够令人恐怖。它们与革命旗帜上所标榜的人民解放与幸福生活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这些以革命的名义公然流行的罪恶并不是一天之间突然从天而降的，而是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回顾历史，我们看得最多的事实就是：这种以人民利益为标榜的革命，最后无不逼使人民为这革命交出一切权利、利益、自由和生命。因为神圣的并不是劳苦大众芸芸众生，而是革命本身，是革命家所描绘的革命政权，最后竟一切权力均归属于个人至上的“革命皇帝”，封建皇权的空前大复辟！

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叶剑英等同志说，这场浩劫把党和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没有任何外敌压境的情况下，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混乱、破坏和倒退的一场大内乱！

所以，邓小平后来说：“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邓选三卷325页）

所以，胡耀邦也说：“多少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封为神，认为谁说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危害之烈，莫此为甚。”（1980年11月23日《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

但是，为什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没有任何外敌入侵的空前统一强大的神州大地，会发生这一连串的灾难最后又导致一场大内乱、大浩劫？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4条说：“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一、（略）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对这一主客观原因都已俱到的概论，不少同志认为它虽然说得似乎十分正确，但也仅仅及其表而未触其根。这“根”就是“造神运动”，就是狂热得古今中外都“史无前例”的群体性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促使毛泽东自己也敢于公然迷信、崇拜自己了，这才是他“逐渐骄傲起来”、“个人专断”、“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主要根源。

那么这是不是说，他的“骄傲自满”、“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迷信、崇拜自己如帝王，完全是因为受到了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举国上下的造神运动的客观影响，而其主观上并无这种与真正的共产党人品质格格不入的欲念呢？很多同志认为“不”，因为这首先就不合毛泽东自己的至理名言。他在《矛盾论》中就论述过：“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毛选二卷767页—769页）

所以应该说，目睹十年浩劫的腥风血雨和国衰民颓，明显地看出毛泽东头脑中具有这种“内因”的人越来越多了。所谓“‘险径应稳步，坦途易翻车’，毛泽东未能以此为训，而失于狐辈之手，令人万分痛惜”云云，不过是为他寻找“外因论或被动论”罢了。因为没有他的私念膨胀，哪会有什么“林彪反革命集团”与“四人帮”等等的“狐辈之手”？！

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事件，表面上是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恩来、声讨万恶的“四人帮”，实质上是对当时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者邓小平的强力支持和对“伟大领袖”越来越背弃原来对人民的承诺而倒行逆施的愤激，也可以说是对造神运动的否定。尽管“伟大领袖”当时健在，还能发号施令，但人们已经豁出去了，看透了！甚至早在1971年秋天林彪叛逃后，山西太原劳改队就有一位原是北京卢沟桥西长辛店人民银行的

名为沙存村的“老右”说：“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等于明朝开国皇帝朱洪武的‘炮轰功臣楼’。”按照《公安六条》，这位“老右”应被“新帐老帐一起算”而人头落地的，但那个劳改队的领导似乎已经很识“时务”，只让他在劳改人员的小组会上批一批就拉倒，连全队的大会都没开，而且不准他人再传说“走漏风声”而“引起不良后果”。这个为笔者目睹的真实事例表明，对无产阶级专政最忠心耿耿的劳改队的干部那时就如此明智，更不用说受苦受难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平头百姓了！

这也可以说是“物极必反”吧！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曾说过：“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毛选五卷425页）万万想不到，他自己此时倒真地踏上了这“物极必反”的可悲路，而疏忘了“民犹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诚然，从愚迷和恐怖中有所觉醒的国人，没有也不可能对他采取“覆舟”之举，但也终于能将其恭抬云天之后又请其回归大地，将其由神复归为人，正如刘少奇的临终箴言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然而可悲的是，我们这片土地毕竟是“神州大地”！它几千年来积淀的培养“神”的土壤委实是太“肥沃”太深厚了，对当权者竭尽抬捧献媚而轻取“二郎神”、“三郎神”高位的高俅式无耻之辈也委实太多太多了！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支持下断然粉碎“四人帮”，本是为党为国为民做了件应该永载史册的大好事；但很快，到处就唱起“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俨然可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并论媲美。接着，就被赞誉为“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为了铁桶般巩固这“英明领袖”的神位，跟着就打出了“两个凡是”的旗帜，说什么对毛主席的任何指示、决策都不能作任何改变，哪怕实践证明许多指示、决策是祸国殃民、人心尽失的。197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据此，铁道部于当月中旬下达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22日，中共中央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发〔1977〕六号”文件的名义，转发了这个《纪要》。28日，国务院又下发“30号”文，文中强调：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所有这些，无异于给《公安六条》又加多了一条！很快，就有因为对华国锋的某些作为不以为然而发表了一些言论的人，被扣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罪名枪杀了，而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被杀五十余人，其中包括江西赣州的女青年李九莲与钟海源——钟海源还被留了一口气，将其心脏立即移植到刑场一辆手术车上的心力衰竭的“革命干部”胸膛内。

这不是紧跟在毛泽东身后的又一位“神”么？！这与我们这个号称无产阶级领导的、不信神仙与皇帝的、人民最自由最民主最幸福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本质有何共同之处？！

~~~~~

【乱世人物】

文化心理个案

• 梅 溪 •

专制和黑暗，对于人们心性具有很强的扭曲性和腐蚀性。晚清诗人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一文，对此有形象的勾勒和颇深的感慨。他以那些被能工巧匠有意扭曲成各种畸形的梅树枝条为例，联想到人的美好天性和健康体态不能顺其自然，得到活泼泼生长，却被病歪歪的社会及其能工巧匠们煞费苦心地扭曲，制作成各种怪模怪样，因而他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愤懑呼声。

这是一个半世纪前最有感悟力的文化人发出的感慨，至今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性。这一个半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和中国人的精神性格到底有多大自由、多大进步或发展，天公是否重抖擞，人才是否真正不拘一格，都十分值得深思。中国的病梅馆关张大吉，还是另换新牌号，重操旧业，干尽扭曲人性之事，亦很值得思考。

自一九四九年开始，五十二年来，这家病梅馆，出产了多少病梅呢？试想，“文革”中召之即来的数百万红卫兵们，耀武扬威，杀了抢了闹了，然后一哄散去，潜入社会，如水之入沙，如今哪里去找？他们大抵与毛泽东政权同龄，如今已经五十岁上下，两鬓泛白，做了父亲母亲，更积极的，大约已经当上祖父祖母，他们有几个真诚忏悔过？倒是有人在书的封面上写道：“我是红卫兵，我决不忏悔。”眼下又轮到他们的儿辈来重复“红卫兵行为”，要么朝美国使馆投石头，要么幸灾乐祸，种种事实显示，这家病梅馆的生意依然持续。它深度残害着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此，作为个案来观察，下面说说江青这个人。

关于江青，既有人写她的传，又有不少文字谈她的事，还有她自己谈自己的经历。这些文字，尽管有许多渲染，却未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触动我的，倒是关于她的两件小事：一件是她少女时代被父亲痛打以及所受的欺凌，另一件是她晚年在狱中做布娃娃。这两件事，使我对这个罪恶的女人，忽然产生同情和悲悯。

把江青作为个人精神文化史的一个个案来研究，应当是很有趣的题目。她早年的穷苦出身和所受的种种家庭暴力、社会不公，使她很容易产生浅层次的反抗心理和叛逆意志。一个受教育很低的人，一个忌恨心和报复心都非常强的人，如果有机会把握权力，就会为害社会，其实江青的不幸，恰好是她有机缘将报复社会变成当代政治的一个事实。

浅层次的仇恨和报复心理，使江青很容易与三十年代那种激进思潮合拍，与狭隘的阶级仇恨和专政思维合拍。所谓阶级仇恨，实质不过是个人的仇恨的放大；所谓专政，实质就是打击报复的同义词，是个人打击报复的扩大化，其文化本质都是酱缸式窝里斗，而丝毫没有文化上的建设和发展。借助这种仇恨思潮，江青早年受到的底层人磨难、家庭欺凌乃至社会欺辱，有了一个貌似名正言顺的旗帜，她那种强烈的仇恨和报复欲望得到呼唤和支持，与暴民式心态和行为汇合在一起。在上海时期的三流演员蓝萍，之所以投身左翼旗下，这种早年人生经历和强烈仇恨性格，起着主要作用。

江青的性格缺乏均衡性，明显具有峻急性、偏激性和歇斯底里，容易发脾气，使小性，摔摔打打，乃至吵闹不休，与同性争风吃醋，与异性闹气则要闹得轰轰烈烈。这些性格特点，都显示心理性格不健全，以及扭曲性，而根子则在她的自私性和狭隘性。早年的屈辱和仇恨，使她的性格格外敏感和脆弱，变得似乎格外自尊，格外不能受屈，不能吃一点亏，否则就被视为压迫她、欺负她，就会强烈反弹、歇斯底里式反抗。

从上海滩演艺界闹到延安的蓝萍，若说有多大政治抱负和野心，恐怕言之尚早，但若说她没有这种欲望，也似乎不合其性格。事实上，此时的蓝萍，与后来“文革”中的江青，尚隔十万八千里，谁也不能预料，这位投奔“革命”女演员，日后会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骄横不可一世的那个女人。这三十年间，还横亘着多种可能性，尽管共产党专政本身多半导致这类结果。

江青这种人需要强权者降服，她到毛泽东那里当了压寨夫人后的那种安静顺从，显示她性格中的卑贱性和世俗性。延安的共产党上层人士，虽然几乎都对这个轻浮女人嗤之以鼻，晓得她在上海滩形迹，强烈反对毛与之结合，但是，却又不能不承认江青在延安与毛同居期间表现出来的那种宁静和规矩。农民出身的山大王毛泽东，虽粗通文墨，其习性决不会比西服革履的唐纳们文明，亦决不会比唐纳们对女性更有平等观念和尊重感，而且光秃秃的延安山头和贫乏的生活，也无法与灯红酒绿的上海相比，无论物质生活还是个性自由。然而，毛江之间安然无事，江青不再飘，不再闹，似乎也不再浪漫。

这是一种单向度的权力崇拜，与狭隘的仇恨心结合在一起，就会成为日后滥权和迫害行为的强大动力，发展为“文革”中那种肆无忌惮的大规模社会迫害。

假如江青的心性中还有道德的观念、悲悯、女性的善良、母性的慈爱，作为一种抗衡力，来制约或削弱那种异化性质的权力崇拜向度，那么她的心性就会呈现一种分裂性、矛盾性，比单向度来得复杂些，她的野蛮行

为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然而，江青不是这么有文化并且复杂的人，她实在是世俗社会底层出来的小女人。她缺乏灵的色彩，心中太黑暗。

依据江青犯下的罪行，枪毙九次犹有余辜。她成为政治角逐场中赌输了的赌徒，做了阶下囚。然而，她晚年在狱中做布娃娃，做得又多又好。这件小事，给我很深触动。

一心做布娃娃，显示江青心性深处尚有一种女性的童心、天真和可爱性。这应当是她的童年或少女时代一种纯真和美好童心在晚年的不自觉流露。少女时代的李云鹤，成长于山东诸城，自然和其他中国小城少女一样，有过最初的美好心性萌芽和人生憧憬，自然也痴痴地喜欢过或凝望过各种可爱的布娃娃造型，就象许多女孩喜欢洋娃娃，而且琢磨过怎么制作一个可爱的娃娃。这种心境，与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共通。可惜，后来在恶浊政治势力扭曲下堕落了。江青使用各种阴谋手段，打击并害死多少人（包括三十年代上海演艺界人士和后来的政界人物），连眼睛都不眨一眨；为了获取最高权力，为了鼓动派系武斗，她尖着嗓门到处喊叫，哪怕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处于生杀予夺状态的江青，以血腥迫害和残酷杀戮为能事，此时心中狂热角逐最高权力，决不会有做布娃娃的心思，也决不会把艺术想象力用在布娃娃的设计和造型上。罪恶的政治倾向和权力欲望，把这个女人生生毁掉了。

潜心做各种漂亮的布娃娃，这种恬静心性，只有被迫远离权力圈之后，才会出现。换句话说，政治角逐和权力欲望，是以扼杀善良和人道为前提的。只有晚年在狱中安安静静做布娃娃，江青才算找回心性中一点点属于她的东西，这时她才象是一个女人。

但丁《神曲》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告诉人们：人是多么容易自我践踏、自我侮辱，多么容易在各种外界势力和内心欲望的引诱和威胁下堕落自毁，多么容易丧失人的道德性和高贵性。

从另一方面看，江青的堕落和犯罪，实在是罪恶政治出产的畸形儿。她和毛泽东同属中国文化糟粕嫁接在马克思、斯大林主义上的一对畸形儿。值得思考的是，使江青这样一个品质恶劣、作恶多端的女人能够突然之间登在亿万人之上那种政治基础及其靠山的文化本质。江青从延安时期那种贤妻良母样态，到共产党执政初期在幕后煽风点火，在文化界挑起一个个事件（包括批判电影《武训传》闹成的事端），直至“文革”时期大露峥嵘，这一历程，不仅显示这个女人的政治野心由潜伏期走向肆无忌惮的暴露（她自比锁在江雾中偶尔露峥嵘的山峰），也一步步暴露此阶段中国专制政治本身的恶劣根性加剧堕落。

此时，国家和政治早已不是民之公器，而是成为文化贫困的毛家店私产。在六十年代初期，江青的照片时时出现在报刊的头版，那是她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的照片。在延安时期曾有规定：不许江青参与政事。现在，毛泽东让江青露面，等于把政治冷宫中的这个女人引向前台，显示她的存在，为将来的用场和政治上的活跃，做出必要的铺垫。同时，也有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抗衡或争锋之意。由这种时时露面到“文革”初期江青的登场，不过是一步之隔。江青是巴望不得，但她只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上的一颗棋子。

江青从“文革”登场开始，虚伪腔调，矫揉造作，加上一批红卫兵称她“江青阿姨”，惹得天下作呕。笔者多次听过这个庸俗女人的腔调，看过她的各种讲话，那种飞短流长的恶毒挑拨，那种对他人的无耻诋毁，那种絮絮叨叨的数落和装模作样的诉苦，那种拖着尖细长音、既似病殃殃又似撒娇式腔调，深感政治的堕落和民族的不幸，竟使这么个俗不可耐的女人飞黄腾达。有那么多老老少少无耻之徒众星捧月般簇拥着她，更有郭沫若在国际性会议上向在座的江青做公开的政治献媚，作诗称颂“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云云。

从江青的堕落和犯罪，可以看出人性是如何被罪恶政治扭曲和毁掉。其他那整整一代人，都可以从此例中得到透视。如果这种罪恶政治不结束，中国人永远不能从这种人性的扭曲中摆脱，将很难走上人格的健全，只能成为新时期这个病梅馆里的一枝。

□ 原载《民主中国》2000年11月号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